



留住家书

The Preservation of Family Letters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5月以来，近40封抗战家书入藏国内首家家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这是面向社会公众征集的成果，也是历史洪流下无数人的缩影。对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发起人张丁而言，这项工作已开展二十余载。他像一个执着的“历史打捞者”，从散落民间的旧纸堆中，抢救、守护着这些薄如蝉翼却重若千钧的“平民史诗”。

为何是家书

2005年4月，张丁积极响应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文化名人的倡议，联合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面向海内外征集民间家书。一封又一封家书从世界各地汇聚北京。“我们征集的目的就是要将它们保存好，将来以博物馆的方式收藏并展出。”其中，就有写于抗战期间的家书。张丁发现，“与其他时期或门类的家书相比，抗战家书更具历史感，文本和故事更感人。”那一年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于是张丁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家书分享给媒体和公众，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次年5月，80封公开征集的民间家书经推荐，入藏国家博物馆。张丁至今难忘当时的场景：“很多老百姓第一次走进国家博物馆，接过收藏证书的那一刻，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是国家给予的认可。”

这些家书背后的故事虽平凡普通，却弥足珍贵，直抵人心。“在整个中国历史图景中，应该有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席之地。这些故事通过家书这个载体被打捞出来，让大家意识到，宏大的历史中也有普通人的身影。”

普通人的家书走进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不仅印证了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坚定了张丁继续抢救民间家书的决心。

为此，张丁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抢救民间家书项目。“中国不缺一个新闻记者，但是缺一个家书抢救者。”张丁异常坚定。

角色转变的过程并不轻松，他将家书抢救工作比作“一片未被开垦的广袤矿藏”，“主持如此大的文化项目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经费的来源、人力物力的投入，都关乎项目的‘生死’。”项目初期凑到的经费，很快就花完了，他一开始以为能挣些稿费，但事实上也并不畅销。

如何让项目走向良性循环，解决生存忧虑，是张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跨越的难题。

好在经过数轮的奔波与漫长的等待，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接收家书项目并成立家书研究中心，漂泊的家书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但张丁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家书研究中心只是一个研究机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是面向全社会的，要和千家万户打交道，并不是关在书斋里做学问。所以，需要一个被大家认可的平台，需要成立家书博物馆，做成具有权威性和独特性的收藏机构。这个初衷从未改变。”



老红军裴超的抗战家书

为了获取认可，张丁不断加大家书征集力度，通过展览、出版等方式持续扩大家书的影响力。在他和助手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历时7年，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终于获批成立，“这是国内首家家书博物馆，也是世界首家家书博物馆。”

烽火里的家与国

目前，家书博物馆共收藏自清初以来的各类家书8万余封，其中抗战家书共有200余封，来自家书博物馆、抗战馆、黄淮海等侨批收藏家及社会各界的捐赠。内容基本分为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指战员家书，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官兵的家书，教师、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家书，华侨、留学生等的家书。

其中不乏爱国名将，比如张自忠、戴安澜，这些家书都由张丁亲自收集。戴安澜将军在写给妻子王荷馨的信中，抒发了“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的战斗豪情。也有平凡英烈，比如褚定侯、胡孟晋、程雄。褚定侯曾在中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前夕，给大哥褚定浩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表达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军人气节。这封家书写于12月27日，当时日军已经渡过汨罗江，正在向南逼近。家书发出后不久，日军就进至浏阳河一线，褚定侯率部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遗愿。

1939年11月28日，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秘书胡孟晋返回前线前，向依依不舍的妻子张惠写下一封辞别书：“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亦更加努力呵！”新四军战士程雄血染沙场前，曾在辞别书中向父母写下：“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

整个民间家书征集的成果中，原件占多数，但仍有部分家书只能收集到电子扫描件，“这些东西太珍贵了，不给原件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张丁来说，家书的内容才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个人收藏向国家收藏的转变，让更多人了解到爱国战士崇高的民族精神。”

在这些抗战家书中，最触动张丁的是海外华侨的家书。华侨家书在闽粤侨乡地区又称侨批，是连带家书与汇款功能的书面凭证。祖国遭受日寇侵略，牵动海外华侨儿女的心，他们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1931年10月31日，“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月，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林锡国就在致儿女的家书中写道：“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曾旅居越南的华侨青年符克回国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党中央选派到海外从事华侨服务抗战工作。1940年2月21日，他在写给父亲和大哥的家书中说：“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与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人)所能负得起的。”



2025年7月16日，徐光耀抗战家书捐赠仪式

在张丁看来，这些华侨家书格外动人，反映了华侨同胞对于祖国兴衰荣辱的强烈关注和奋力挽救国家的赤子情怀。“华侨同胞普遍生活较为安定，有的家资充裕，本来工作、生活很好，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投身血与火的战场，有的付出了生命。每每读到他们的家书，我都深受感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随着抗战家书征集活动的开展，66岁的甘肃会宁退休教师裴久诚向家书博物馆捐赠了叔父裴超的三封家书。三封家书均写于抗战时期，由裴超寄给大哥裴俊德，后经裴俊德之子裴久诚保存至今。1936年，裴超加入红军。第一封家书从山东费县发出，第二、三封从江苏盐城发出，裴超书写家书的轨迹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轨迹重叠，他的书信也因此成为历史的注脚。

同时，《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写于抗战后期的家书也入藏了家书博物馆。1938年夏天，13岁的徐光耀加入了八路军，在他的带动下，父亲和姐姐都积极参与抗日工作。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朴素的家国情怀从这封家书的字字句句中浮现出来：“爹！您耐心的（地）等着吧！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您不信，我姐姐会告诉您在形势是多么有利。”后来的文学道路中，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创作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等多部以抗战题材为主的作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成为贯穿始终的精神要旨。

“14年抗战的历史离我们渐渐远去，人们对它的印象也渐渐模糊，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但是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这种民族记忆不能消失，我们要让它留下来。”张丁说。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抗战家书”展区

穿越时空的永恒回响

传承记忆的方式有很多，家书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路径。“因为它是真实的，带有个人情感的，记录了家书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提供了抗战历史的若干细节，为我们回顾、还原、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每封家书后面都站着一个鲜活的人物，这个鲜活人物的背后又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

“历史是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集合体，抗战历史尤其如此。既有悲壮的难民流徙，亦有激昂的国民呐喊，既有壮烈的火线厮杀，亦有温馨的后方情话，军旅豪情，柴米油盐，所有这一切，都真实地记录在家书中。”这些家书的作者们既是抗日英雄，也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一份子。张丁认为，抗战家书代表的是抗战时期的个体记忆，一封封家书汇聚成抗战时期各阶层的集体记忆，通过家书这种第一手的史料可以以更真切、更深刻地理解抗战精神的内涵。“抗战家书的很多作者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投身抗日战场，以血肉之躯执行保国重任，他们是钢铁一样的战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有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孩子，他们爱这个国家，也爱自己的亲人，家书里处处体现尊老爱幼、兄弟友爱、夫妻恩爱等中华传统美德。然而，他们为了民族大爱，错过了对家人之爱，为了大家，舍去了小家，这种大爱情怀令人敬仰。”

“不同于官方档案，我们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历史的鲜活和温度。了解抗日战士们所思所想，了解他们在大时代中如何作出人生抉择，这种历史经验放在如今的时代仍然适用。现在的我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那我们该如何攻坚克难、持续奋斗？应该从历史中找经验，从前人的故事中找答案。”

除了宝贵的精神内涵，优秀的家书文化同样值得传承。面对数字化的洪流，张丁并不认为家书文化会随之消逝。“从大的社会发展历程来讲，传统意义上的手写家书肯定是告一段落了。当更高效便捷的通信方式成为主流，旧有形式必然退场。”但他坚信，“家书文化的核心精髓并不会因此消亡，它会以一种崭新的形态继续存在。”

日常生活中，张丁在使用微信、邮件等通信工具时，会将内容尽量写得详尽。他说：“我不会三言两语就将人打发了，该问候的问候，该讲事的讲事。”信息化时代，家书文化所蕴藏的厚重历史、中华传统美德和人间真情，恰恰是年轻一代需要汲取的精神养分。“诸如《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这样的经典，其中蕴含的做人处世的智慧与箴言，历久弥新，依然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

为此，张丁提出了两个口号，“保护家书遗产”和“传承家书文化”。在他看来，真正实现这两个目标之前，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对于未来，我还是忧心忡忡。”

张丁坦言，目前馆内仅有包括他在内的两名专职人员，人力与物力的投入严重不足。许多精心规划的发展设想，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长期停留在纸面，难以付诸实践。明年将迎来家书博物馆成立十周年，但该馆目前尚未达到张丁所期望的良性循环。“我们希望有一支精干的团队全身心投入这个项目，还有很多珍贵的家书散落民间，未能得到收集与保护。家书抢救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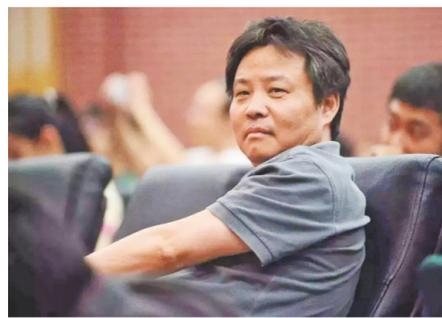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前身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家书展厅，2016年10月26日正式揭牌成立，著名书法家沈鹏和罗扬分别题写馆名。家书博物馆以收藏、保护、展示、研究、弘扬传统家书文化遗产为己任，主持全国性抢救民间家书项目，下设家书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建设中国家书档案资料中心和家书、家训、家教、家风文化传承基地。

家书博物馆现收藏家书8万余封，时间从明末清初至21世纪，主要是晚清民国以来普通人的家书，包括红色家书、抗战家书、廉政家书、军旅家书、知青家书、两岸家书、海外家书、抗疫家书等。其中也有一些名人家书，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黄兴、蔡锷、陈独秀、钱玄同、任鸿隽、陈衡哲、陶铸、邓子恢、林默涵、谢冰莹、滕代远、朱学范、项南、巴金、陈翰笙、胡华等。

面孔

余华：写作构成了我的人生



最近，《余华写作课》出版。从早期创作遇到的障碍，到后期写作技巧的提升，余华以自己的写作体验，展现了一条长达四十余年的写作进阶之路，也是一条人生之路。正如他所言：“写作的问题和人生的问题很难区分开来。”

1977年恢复高考后，余华接连两次落榜，于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成为一名牙医。这对他来说是一份非常无趣的职业。为了通过技能特长进入文化馆工作，余华决定写小说，白天在单位上班拔牙，晚上回家写作。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对苦难的观察视角，冷漠叙事成了他作品的底色。

除了提供一份职业，写作还让他收获了一段被当代文坛传为佳话的友谊。在他看来，定义挚友的关键一点就是价值观一致。即便自己和莫言、史铁生两人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但三个人对于文学的看法往往一致。写作或许是孤独的，但友谊让他不再孤独。

四十余年笔耕不辍，稿纸上的字句既是生命的年轮，亦是活着的明证。余华说：“写作让我拥有了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一条是虚构的。”当虚构与现实最终合流，写作本身便成了最真实的活着。

沙武田：

让更多人走进真实的敦煌



今年，是沙武田踏上敦煌这片土地的第二十九个年头。1996年，这位刚毕业的年轻人自西安启程，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敦煌。

第246窟，是沙武田在敦煌邂逅的第一窟。那时候，即便是最简单的图案，也令他茫然不解。于是，决心弄懂敦煌的沙武田留了下来。他看洞窟、认壁画、翻文献、摹画稿，也爬过二三十米高的蜈蚣梯。为了不浪费看窟时间，他常常从清晨窟区开放待到日落洞窟关闭，有时只能啃几口干粮充饥。沙武田沉浸其中，对于那时的他来说，离开敦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直到2014年，沙武田选择走出敦煌，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开拓更广阔的学术道路。他说：“在敦煌看敦煌，容易陷进去。敦煌很多东西的源头在长安，从长安回望敦煌，再向全国、全世界延伸，才能找到更多研究视角。”二十九年来，沙武田如虔诚的朝圣者，往返于西安与敦煌之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敦煌，他带领学生和各类学者深入洞窟教学研讨，执笔编写《藏经洞史话》等通俗类读物，还担任《河西走廊》《中国》等纪录片的学术顾问和学术统筹工作，让千年文明跃然荧屏。沙武田常说自己是敦煌的“孩子”，那里所有的洞窟，他都走过无数遍。二十九载光阴，他守护的不仅是被风沙侵蚀的敦煌，更是中华文明千年不灭的星火。

魏科：

气候危机时代已至



目前，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环境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国际议题之一。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涝与高温侵袭，极端天气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侵扰日常生活。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科表示，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气候变暖。在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前，变暖趋势不仅将持续，更将不断加速。即便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之后，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稳定仍需上百年的时间，其后还需要上百年的才能稳定温度，而温度上升还会带来更长时间的海平面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当下的抉择不仅关乎当代安危，更将重塑子孙后代的生存根基。

极端气候下，农业生产、城市运行、民众生活等方面受到的冲击已经不断凸显，其影响范围甚至波及新能源、海上航运、城市规划等行业。魏科警示，气候危机就像“温水煮青蛙”，如果缺乏紧迫感，未来可能彻底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气候危机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们寻求更加全面可持续的解决路径。对此，魏科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比如，更新农业基础设施、向绿色能源转型等。

(□记者 蔡心 整理)

张丁：于故纸堆中守护『平民史诗』

□ 本报记者 蔡心